

未来中国的 变与不变

新秩序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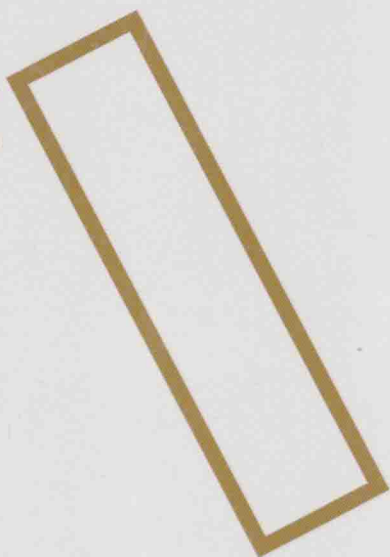
孙立平

郑永年

华生

等著

The future of
China's
changed and
unchanged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未来中国的 变与不变

新秩序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孙立平 郑永年 华生 等

／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未来中国的变与不变 / 郑永年等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310-4

I. ①未… II. ①郑… III. ①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2045号

书 名 未来中国的变与不变

著 者 郑永年 等

责任编辑 孙金荣

策划编辑 汪毓楠

特约编辑 李正湫

文字校对 孔智敏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版面设计 李 亚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06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310-4

定 价 3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1章 未来中国的新秩序

- 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 [美]阿玛蒂亚·森 / 002
- 我们面临的新风险与新秩序 郑永年 / 014
- 中国该有怎样的发展路径 甘 阳 / 026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经济学意义吗? 崔之元 / 030
- 中性政府仍会在未来发挥大作用 姚 洋 / 034
- 中国凭什么统治世界? 许纪霖 / 045
- 没有新观念,经济以什么为基础?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 050
- 世界新格局中的中国机会 张文木 / 055
- 绿色转型的中国蓝图 胡鞍钢 / 061

第2章 中国传统再解释

- 传统之新意须以未来为导向 修远 / 066
- 黄河边的中国版图 曹锦清 / 072
- 近30年中国的私生活传统 高超群 / 080
- 在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中“不断革命” 韩毓海 / 092

儒家传统如何回应“西方启蒙”？ 杜维明 / 099

汉代的难题：经济自由与富国强兵 盛 洪 / 107

第 3 章 现代之恶

可融入的城市化是成功现代化的密码 华 生 / 114

城市也要“政治化”改革 郑永年 / 117

强拆不是城市化的必走之路 盛 洪 / 129

未来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新专制 赵汀阳 / 138

第 4 章 七品政治的逻辑

重构基层政治单位 秋 风 / 148

中国地方治理的上下“合谋” 李永刚 / 157

也谈“地方大员” 仝志辉 / 165

地方政府允许“公司化”吗？ 周飞舟 / 171

第 5 章 改革路上的“硬骨头”

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 孙立平 / 178

腐败与反腐都已进入深水区 张 鹭 / 185

为什么成功的反腐案例凤毛麟角？ 李 辉 / 195

第 6 章 世界在暗处

远未结束的全球金融危机 王湘穗 / 206

世界经济进入再平衡 张 平 / 212

旧制度与新媒体政治 吴 强 / 218

美国还是一个领导者吗? [美]小约瑟夫·奈 / 224

中美大国关系的想象与预言 时殷弘 / 234

霸权之后? ——当代世界的权力结构 [美]佩里·安德森 / 238

第7章 中国社会各阶层扫描

我们所剩的资源只有“身体” 佟 新 / 246

被“单位”吸纳的阶级 张 静 / 252

“卡位”的社会,各阶层还有机会吗? 高 勇 / 261

新的阶级诞生了吗? 赵月枝 / 267

第8章 经济升级的新机会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实验室” 贾晋京 / 276

边缘的经济力量改变中国:上海自贸区实验 郑永年 / 285

“自由体制”下的中国战略 吴敖祺 / 297

“开放倒逼”迫使改革升级 鲁 楠 / 308

第9章 大数据风暴

“大数据风暴”如何发生? 胡 凌 / 316

3D打印的身份革命 胡 凌 / 325

是商机,也可能是危机? 胡 凌 / 332

互联网让“整个世界都恰到好处” 王俊秀等 / 342

未来中国的新秩序

风险社会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最大的“未知数”，例如生命的长短、事业的成败、地位的高下、权力的大小，以及各种人伦情感的维系，都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除了生死，似乎都可以依照主观努力来改变了，而且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意志甚至道德品质和生命价值的基本尺度。

财富逐渐成了其他价值的衡量标准和交换手段。先前主要是一个人所面临的失败和破产的风险，逐渐变成整个社会对于老无所依的恐惧、对于钱不值钱的忧虑，对于世风日下的警醒及对于水和空气的担心。

危机之后的资本主义

>> [美]阿玛蒂亚·森（哈佛大学教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否需要变革？一些支持无约束的资本主义（unfettered capitalism）、拒绝变革的人们相信，将短期经济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是一种过分的谴责。

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不良的政府管理和不良的个人行为（如“华尔街的贪婪”）导致的。然而，另外一些人却看到了现行经济安排中真正严重的缺陷，并想要进行改革，他们正在寻找一种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在巴黎举行的一场名为“新世界，新资本主义”的论坛上，新、旧资本主义的观念扮演了活跃的角色。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Nicolas Sarkozy）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进行了具有说服力的发言，指出变革的必要性。同样，德国总理安格拉·默

克尔 (Angela Merkel) 也提出“社会市场”——由共识—建构政策 (consensus-building policies) 的组合来约束的市场——这个旧的德国观念作为新资本主义的可能蓝图 (虽然在最近的危机中, 德国并不比其他的市场经济体做得更好)。

就长远而论, 社会组织当然是需要改变的, 这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眼前的危机。在可能出现的很多问题中, 我将分离出以下三个。第一个问题, 我们真的需要某一种“新资本主义”吗? 我们原来的经济体系, 并不是单一集中式的经济体系, 它建立的基础是实践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制度, 它的社会价值是我们可以从道德上进行辩护的。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一种形式的新资本主义, 或者, 套用巴黎会议的说法, 一个“新世界”, 以建立一种不同的体制。第二个问题,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哪种经济学, 特别是考虑到眼下的经济危机, 我们如何评价理论经济学家所教导和拥护的、作为经济政策之向导的经济学思想? 这包括: 我们如何评价随着危机的加剧而发生的凯恩斯主义之复兴。尤其是, 目前这场经济危机指示我们去寻找哪一种体制、哪一种优先性。第三个问题, 除了努力对长远的变革需要的是什么进行更好的评估之外, 我们还不得不思考——快速地思考——如何在尽可能减少损失的前提下摆脱目前的危机。

二

是什么特殊性质使得一个体制成为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体制 (无论新的还是旧的)? 如果要改革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那么, 是什么令改革的结果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别的东西? 普遍的观点似乎认为, 依靠市场进行经济交易是将一种经济体确认为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与此类似, 依靠利润驱动和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之上的个人报酬, 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然而, 如果这些是必要条件, 那么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 比如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体制, 果真是资本主义的吗?

世界上所有的富裕国家，包括欧洲的富裕国家，和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已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部分地依靠非市场的交易方式和其他偿付方式了。这包括失业福利、公共养老金、其他形式的社会保障，以及教育供应、健康护理和其他一系列不通过市场安排来分配的服务。与这些服务相联系的经济权利，并不建立在私有权和财产权的基础之上。

同样，市场经济也并非仅仅依靠利润最大化来运转，它还依靠很多其他活动，比如维持公共安全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其中一些已经远远不是仅由利益驱使的经济活动了。在运转良好的时候，所谓的资本主义体制令人称道的表现，来自一种混合机制——公共基金教育、医疗护理和大众运输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种机制不用依赖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和局限于私有制的个人权利。

这个讨论的背后是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在今天，资本主义是不是一个具有特定用法的术语？在历史上，资本主义观念确实具有过重要的地位，然而到如今，其有效性或许已经所剩无几了。

比如，亚当·斯密在18世纪的先驱性著作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动力机制以及这种动力机制何以能够运转，特别是它怎样运转。正当这一运转机制强势地兴起时，斯密的研究提供了一份对于市场之运转的具有启发意义的诊断。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对于理解所谓的资本主义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斯密说明了，自由交易是如何通过生产专业化、劳动分工和充分利用大规模经济，从而极为有效地促进经济繁荣的。

这些学说直到今天仍然是非常切题的（有趣的是，为保罗·克鲁格曼赢得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品对于国际贸易作出的令人印象深刻、高度精深的分析，和斯密230多年前的高瞻远瞩密切相关）。在18世纪对市场 and 资本运用的早期阐释之后，紧接着出现的经济学分析在主流经济学内部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牢固的市场观念体系。

然而，就在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进程带来的积极贡献正被阐释和说明的同时，其消极的一面，也常常为同一些分析家所洞察。虽然大量的社会批评家（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谴责，以及对它的最终取代方案，但是，即便是对于亚当·斯密来说，完全依靠市场经济和利润驱动的巨大局限性也同样是足够清楚的。事实上，包括斯密在内，市场运行的早期提倡者们并没有把纯市场机制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完美的运行体制，同样，他们也并不认为利润驱动就是所需的一切。

即便说人们寻求交易是出于私利（self-interest，根据斯密的著名说法——想要解释面包工、酿酒师、屠户和消费者为什么寻求交易，只需私利就足够了），但是，只有建立在不同人群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一种经济才能有效运转。如果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活动在内的商业活动形成一种信用，即它们能够、并将会做自己承诺之事，那么，借贷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够以一种互助的方式平稳地进行下去。正如亚当·斯密所说：

一国人民若相信某银行家资产雄厚，行为诚实，处事谨慎，换言之，相信他有随时兑换现金的能力和意思，那银行家发行的本票，便可在社会上通用，无异于金币银币，因为人们深信它们可以随时兑换金银货币。

斯密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情况有时候并未发生，而且，我认为，对于商业和银行如今面对的由广泛的恐惧和不信任所带来的困难——这种恐惧和不信任冻结了信用市场，妨碍了信用的有序扩张——他不会感到特别困惑。

在这个背景之下，特别是考虑到“福利国家”是在斯密的时代之后很长时间才出现的，因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不同作品中，他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命运的极度关注是非常显著而令人惊讶的。市场机制最切近的不足之处，就隐藏在那些市场无所作为的事情之中。斯密的经济学分析

根本不是把一切交给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他不仅支持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用，比如教育和贫困救济（同时，要求那些接受援助的贫困者获得比当时的《济贫法》给予他们的更大的自由），而且他深深地关注可能存在的赤贫和不公正现象（除非消除它们，否则市场经济便是不成功的）。

很多自称追随斯密的人对市场的必然性和自足性缺乏清楚的区分，因而对斯密对市场机制的评估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斯密对食物市场的支持以及对国家限制食用粮食私人交易的批评，经常被解释为这样一种观点：任何国家干预必然会导致饥荒的恶化。

但是，斯密对私人交易的支持，仅仅是为了反驳那种认为停止食物交易就能够消除饥饿负担的信念。这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否认，市场的运转需要国家行为通过创造工作岗位和收入来进行补充（比如，通过工作法案）。如果失业的急剧增长是因为不良的经济环境或者不良的公共政策，那么市场无法仅凭自身重新创造出那些失业者的收入。斯密写道，“新的失业者要么饿死，要么通过乞讨或犯罪——甚至可能犯极恶之罪——来维持生存”，而且“贫困、饥荒和死亡将会立刻弥漫……”斯密反对排斥市场的干预，但是不反对那些容纳市场并且以补充市场未做的重要事务为目标的干预。

斯密从未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至少在我能够搜寻的范围之内），然而，想要从他的著作中塑造出任何一种论证市场力量的自足性或论证接受资本统治的必要性的理论也是很难的。他讨论的是那些更加宽泛的价值的重要性，这些价值超越了《国富论》中的利润，在他的第一本书，正好在250多年之前的1759年发表的《道德情操论》中，他对以非逐利价值为基础的强烈的行为需要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当他写到“审慎”是“所有德行中对个人最有用处的”时，亚当·斯密接着说，“仁慈、正义、慷慨和公共精神，是对他人最有用处的品质”。

斯密认为，市场和资本在它们自己的领域之内运转良好，但是，首先，

它们需要来自其他机构——包括公共服务，诸如学校——以及纯粹利润追求之外的价值的支持。其次，它们还需要来自其他机构的限制和纠正——例如设计良好的金融规则和国家对穷人的援助——以防止不稳定、不公正和不正义。如果我们想要寻找一种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方式，它包括对各种公共服务和考虑周详的规则合乎实效的选择，那么，我们会是在跟随，而不是背离斯密对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和批评中所描绘的改革计划。

三

历史地看，直到新的法律体系和经济实践对财产权进行保护，并使得一个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之上的经济能够运转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出现。在商业道德使得契约行为变得可以维持并且不再昂贵——比如，不再需要对疏忽职责的契约方进行持久的诉讼——之前，商业交易是无法有效进行的。在因腐败而获取的高利润受到限制之前，对生产性行业的投资也不能够繁荣。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始终要依靠其他制度性价值的支持。

由于充斥着衍生物的二级市场和其他金融工具的迅速发展，与交易相联系的道德和法律的义务及责任在近些年来已经变得难以辨认。现在，一个误导借贷者承担轻率风险的次级贷款的贷主，可以将金融资产转移给远离原初交易的第三方。可问责性被严重削弱了，监督和规范的需要变得更加强烈。

然而，就在同一时期，由于越来越相信市场经济的自我调控性质，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监督任务被急剧缩减了。恰恰在更需要国家监督的时候，被需要的监督却收缩了。2008年实际发生的灾难就是这一隐患的结果，它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今天这场困扰着世界的金融危机。金融活动之规范的不足，不仅牵涉到非法活动，而且隐含着过度投机的倾向。正如亚当·斯密所说，这一倾向将很多人掌控在他们的紧张得令人窒息的利润追逐之中。

斯密将那些过度的求利风险的鼓吹者称为“投机分子”，这一说法是对过去几年中的次级贷款放债人的绝好形容。例如，在讨论反高利贷法的时候，斯密希望国家规范在那些鼓吹不稳定贷款的“投机分子”面前，为公民提供保护：

这样，国家的巨大资本，就不能为想赚钱并有利使用的人所用，而落入那些浪费者和破坏者的手中。

对于市场经济的自我纠正能力的盲目信任，在很大程度上，要为美国的制度规范之被取消负责，它如此忽视投机分子的活动，足以令亚当·斯密震惊。

目前的经济危机，部分产生于一种对于市场进程的明智性的过度高估，而现在，这场危机正在被金融市场和一般的商业领域中的焦虑和信任缺失加剧，这种焦虑和不信任在市场对一系列刺激计划（包括对奥巴马新政府于2009年2月份通过的7870亿美元计划）的反应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也许不是巧合，斯密在18世纪就已经指出了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它们还是被近些年来的权威人士忽略（特别是在美国），并且被那些一直忙着引用亚当·斯密以支持无约束的市场的人们忽略。

四

就在近来亚当·斯密被大量引用（即使没有被大量阅读）的时候，最近又出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强盛复兴。确实，我们正在经历的、令我们步步濒临经济萧条的渐进式经济低迷（the cumulative downturn）具有明显的凯恩斯主义特征：一个人群的收入降低导致他们的消费衰减，进而反过来导致其他人群的收入降低。

然而，只是在非常局部的意义上，凯恩斯能够是我们的救星。并且，

在对目前危机的理解中我们需要超越他的视角。有一个经济学家在当前的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他是凯恩斯对手庇古（Arthur Cecil Pigou），他和凯恩斯同时代，并且也在当时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庇古远比凯恩斯更加关注经济心理学（economic psychology），以及它影响商业循环、塑造和强化把我们推向经济萧条的商业衰退（恰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方式。庇古将经济波动部分地归咎于“心理原因”，它包括：

人们（他们的行为控制着产业）的心理波动，这种心理波动来自对商业预期的不当乐观或不当悲观所导致。

很难忽略这一事实，即在“相互强化的低迷”的凯恩斯效应之外，今天，我们强烈遭遇到了“不恰当的悲观主义的错误”。庇古特别强调，当经济被过度的悲观主义控制时有必要解冻信用市场：

因此，在其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商业失败的扩散是广还是窄，取决于银行贷款的获得，在面对需求危机的时候，是易还是难。

尽管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拥有新的资产流动性的大量注入（大部分来自于政府），然而银行和金融机构直到现在仍然不愿意解冻信用市场。其他商业领域也在持续衰退，这部分是对已经衰减了的需求的反映（凯恩斯主义的“乘数”过程），但同时，这也是由于恐惧普遍消沉的气氛中未来需求的走低（庇古主义的传染性悲观主义）所造成的。

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处理的一个问题在于，起因于金融管理不善和其他违规现象的现实的危机，被一场心理崩溃放大了好几倍。现在，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正被讨论的再生信用市场的方案，包括紧急融资（企业要求对真正放贷的金融机构进行补贴），政府购买不良资产，针对偿款失败进行

保险，以及银行国家化（这最后一个提议把很多保守派吓坏了，正如交给银行的公共资金被私人控制让关心可问责性的人们感到担忧一样）。迄今为止，市场对于政府提出的方案的回应很冷淡，这说明，这些政策中的每一个都要求部分地评估其对商家和消费者的心理影响，特别是在美国。

五

还有一个理由，也能够说明庇古和凯恩斯之对比的重要性。尽管凯恩斯非常关注如何增加总收入的问题，但是他对财富和社会福利分配不公问题的分析，却相对较少。相比之下，庇古不仅有对福利经济学的经典研究，而且他率先把对经济不公的评测作为经济和政策评估的主要指标。既然在每一种经济体内部，以及在全世界，最贫穷者的苦难迫切需要关注，那么政府和商业之间的支持性协作的作用就不能仅限于相互协调推进经济。在安排对目前危机的反应方案时，在不择手段地进行普遍性经济扩张时，我们有进行批判的必要，并给予社会底层以特别的关注。受到失业威胁、缺乏医疗护理并且遭到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剥夺的家庭承受了尤为严重的打击。凯恩斯主义在处理他们的问题上面的局限性，需要引起我们更大的注意。

凯恩斯需要被补充的第三个方面，涉及他对社会服务的相对忽视——事实上，在这个课题上面，甚至奥托·冯·俾斯麦都比凯恩斯谈得更多。我们时代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包括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已经在讨论市场经济在提供公共福利（比如教育和健康护理）方面的重大缺陷；通过对“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市场交易的收益和损失并非仅限于直接的买者和卖者——的强调，庇古也对这个课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话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医疗护理不能保证提供给所有人的话，那么经济低迷的阵痛将会更加剧烈。

例如，在缺乏国民医疗服务的情况下，每一次失业都将导致更大的问题，即失业者被排除在基本的医疗护理之外，这要么是因为收入的丧失，要么是因为和工作绑定在一起的私人医疗保险的丧失。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为7.6%，而严重的匮乏状况已经出现。值得一问的是：几十年以来，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内的欧洲国家，何以能够在失业率高得多的情况下成功避免生活质量的全面崩溃？部分答案在于，欧洲福利国家的运转方式具有比美国强大得多的失业保险；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欧洲国家向全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市场机制提供面向全民的医疗保健的失败是臭名昭著的，其最显著的体现是美国，另外是在1979年废除了全民医疗保健之后的中国，卫生和保健事业的进展出现了急剧的停滞，也体现了这一点。在那一年的经济改革之前，国家或合作社向每一个中国公民提供了健康护理的保障，即便水平相当低。在取消了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和官僚控制的工业单位这种对生产有害无益的制度之后，中国获得了高于任何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但同时，在对市场经济的信任的引导下，中国也取消了全民医疗保健制度；而且在1979年改革之后，健康保险不得不由个人购买（除了在一些相对罕见的情况下，国家或某些大公司向它们的雇员或家属提供保险）。由于这一转变，中国在人均寿命方面的增速放缓。即便在中国的总体收入急速增长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当中国经济急剧减速的时候（正如现在的情况），它便注定要成为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尽力逐步地重新引入面向全民的医疗保险，而奥巴马之下的美国政府，也致力于使得健康保险全民化。中国和美国的调整进程都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在应对经济危机以及实现两种社会的长期转型方面，这一调整应该是居于核心地位的。